

元史 金史 辽史 宋史 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 新唐书 旧唐书 北史 南史 隋书 周书 北齐书 魏书 陈书 梁书 南齐书 明史 元史 金史

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

精华

旧唐书（一）

主编 廖盖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毛泽东读《旧唐书》

二十四史之一的《旧唐书》，为五代时期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唐史。此书完成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(945年)，共二百卷，包括本纪二十卷，志三十卷，列传一百五十卷。记载了李渊武德元年(618年)至天祐四年(907年)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历史。它原名《唐书》，宋朝宋祁、欧阳修编写的《新唐书》问世后，才改称《旧唐书》。

《旧唐书》是毛泽东在《二十四史》中读得较多的史书之一，尤其是对其中的人物传记颇为留意，并作了大量批注。

李渊遇事无断制

唐高祖李渊(公元566—公元635年)字叔德。祖籍陇西狄道(今甘肃临洮南)，北周大贵族唐国公李虎的孙子，七岁承

袭唐国人爵位。

公元617年，李渊任隋太原留守，乘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机，起兵反隋，攻入长安，立杨侑为皇帝。公元618年，李渊建立唐朝。公元626年传位李世民，635年病卒。

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，摘取隋末农民起义果实。立隋代王为皇帝，争取到政治上主动权，削平群雄，统一全国。李渊较早地把皇位让给27岁的李世民，使李世民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他自己为太上皇，也是明智的选择。

《高祖本纪》中说：“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。七岁，袭唐国公。及长，倜傥豁达，任性真率，宽仁容众，无贵贱咸得其欢心。隋受禅，补千牛备身。父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。

史臣曰：……然而优柔失断，浸润得行。诛文静则议法不从，酬裴寂则曲恩太过。……不有圣子，王业殆哉！”

毛泽东在“倜傥豁达，任性真率，宽仁容众”诸语旁批道：“遇事无断制。”

唐高祖李渊(566—635)，是唐王朝的开国之主。起兵于隋末乱世，倒也不失为一代雄主。毛泽东说他“遇事无断制”，这大概是从李渊“宽仁容众”的性格特点，想到他在整个起兵过程和平定诸雄的战争中，主要依赖他的儿子李世民等，包括起兵反隋这一重大决策，也是李世民的主意。乃至最后不能制衡诸子，导致玄武门之变，李世民杀其兄长，自己也被逼退



位，去做清闲的太上皇。比较起来，开国之功，李渊确在其子李世民之下远甚。故《旧唐书》作者在《高祖本纪》里也发议论说：“不有圣子，王业殆哉！”认为唐高祖李渊如果没有李世民这个“圣子”则江山必垮，毛泽东是赞同这一看法的。

名将冤死

《旧唐书》卷六十九中包括《盛彦师传》、《刘世让传》、《李君羡传》等人物传记，毛泽东读到这些传记时，深为他们的受冤而死不平。

《盛彦师传》载：会徐圆朗反，彦师为安抚大使，因战，遂没于贼。圆朗礼厚之。令彦师作书报其弟，令举城降己。彦师为书曰：“吾奉使无状，被贼所擒，为臣不忠，誓之以死。汝宜善侍老母，勿以吾为念。”圆朗初色动，而彦师自若，圆朗乃笑曰：“盛将军乃有壮节，不可杀也。”待之如旧。贼平，彦师竟以罪赐死。

读此，毛泽东批注道：盛彦师名将，冤死。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220页）

盛彦师在隋末投入李世民的起义军，在征讨李密、王世充诸战役中，建有大功。李密先与李渊、李世民结盟，灭隋后互争天下。在别人不敢迎战李密时，盛彦师自告奋勇，率几千人

在熊耳山南侧伏击李密，并斩杀之。遂以功封葛国公，拜武卫将军。所以，毛泽东说他是“名将”。后在讨伐叛乱的徐圆朗时，战败被擒，徐圆朗让他写信劝降其弟，他只字不提劝降之事，反而表达了“誓之以死”的气节，徐圆朗也不得不钦佩他，因而也没有杀他。待徐圆朗被讨平后，盛彦师竟被李世民赐死。所以，毛泽东说他是“冤死”。毛泽东的批语，写在《盛彦师传》的开头部分。

《旧唐书》卷六十九还包括《刘世让传》、《李君美传》。刘世让曾在隋朝任征仕郎，后投唐高祖李渊，拜为通议大夫。李渊问以备边之策，刘世让建议：可在一个叫崞城的地方置一勇将，多储些金帛，有来投降的人便重赏，然后出兵破坏马邑一带的农耕之业，不到一年，就可以拿下突厥进犯中土的要津马邑城。李渊说你去最合适。刘世让赴任后，突厥害怕他，就造谣说他与可汗通谋，将要叛乱。李渊听信谣言把他杀了，并“籍没其家”。毛泽东读此批道：刘世让冤死。

李君美初为王世充驃骑，后归降李世民，为武卫将军。贞观初年，太白星常在白天出现，有人占卦说将有一个女人出来称武王。恰巧李君美是武安人，又任武卫将军，封邑又是“武连郡公”。一次作酒令，李世民让武官各言自己的小名，李君美自称小名“五娘子”。有人就奏劾李君美将谋乱，李世民便把他杀了。读至此，毛泽东批注：李君美冤死。这几则批注表



达了毛泽东对冤假错案的不平与愤慨。

笑里藏刀李义府

《旧唐书》卷八十二《李义府传》载：“义府貌状温恭，与人语，必嬉怡微笑，而褊忌阴贼。既处权要，欲人附己，微忤意者辄如倾陷。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。又以其柔而害物，亦谓之“李猫”。读此，毛泽东批道：笑里藏刀李义府。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223页）

李义府(614—666)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的大臣，先后任中书舍人、中书侍郎参知政事、中书令、右相。与许敬宗同执朝政，权倾一时。本传载，李义府借武后之势，“专以卖官为事”，“入则谄言自媚，出则肆其奸宄，百僚畏之，无敢言其过者。”加之为人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搞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颇为百官痛恨。后因罪流放冀州。毛泽东对这样的人，是极其鄙薄的。

毛泽东尤其不喜人搞两面派，搞阴谋，多次表示过对这种人的愤慨之情。但是党内还是出现了一些“笑里藏刀”的阴谋家，使党的事业大受损失。这不仅仅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失察，更主要的是体制上的弊病，容易使机体出毛病。



朱敬则是政治家、历史家

朱敬则(635—709)是毛泽东较为欣赏的一个历史人物。他在唐朝武则天称帝时,曾任正谏议大夫等职。毛泽东在《旧唐书·朱敬则传》开篇的天头上批注:朱敬则政治家、历史家。(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226页)“朱敬则”三字旁,毛泽东又用粗重的黑铅笔加了三条直线,批注:年七五。这是指朱敬则死时享年75岁。

朱敬则在武则天执掌朝政时,曾向她提出“宜绝告密罗织之徒”的建议。他上书武则天,举秦朝灭亡为例,上疏曰:“臣闻李斯之相秦也,行申商之法,重刑名之家。杜私门,张公室。弃无用之费,损不急之官。惜日爱功,疾耕急战。人繁国富,乃屠诸侯,此救弊之术也。故曰:刻薄可施于进趋,变诈可陈于攻战。兵犹火也,不戢将自焚。况锋镝已销,石城又毁,谅可易之以宽秦,润之以淳和。八风之乐以柔之,三代之礼以导之。秦既不然,淫虐滋甚。往而不返。卒至土崩,此不知变之祸也。毛泽东在这段评述处,逐字都加了旁圈。由朱敬则这段关于历史的分析,毛泽东联想到汉朝贾谊的《过秦论》,在天头上批注:“贾谊云:‘仁义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’”。贾谊和朱敬则都认为,秦朝的灭亡,其值得后世汲取的深刻教训是对



人民施行暴政，丧失了民心。贾谊和朱敬则都熟悉历史，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，都有视人民力量为国家兴衰、帝王成败的重要因素这一进步政治思想。所以毛泽东称赞他们都是“政治家、历史家”。

朱敬则在上书武则天时，又举汉朝初定之后，孙叔通杂采古礼和秦代制度，同儒生共立朝仪：陆贾著《新语》，为汉高祖论述秦及古代兴衰之国的经验教训，说明天下既定，“陈诗书，说礼乐，开王道，谋帝图”，乃是非常必要的。他建议武则天“览秦、汉之得失”，“改法制，立章程，……室罗织之源，扫朋党之迹，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”。对朱敬则的这些意见，武则天认为，“甚善之”。以上引文都是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的重点内容，在天头上也多处画着三个大圈作标记。

朱敬则生性耿直。御史大夫魏之忠、凤阁舍人张说被诬陷，将处死刑，“诸宰相无敢言者”。独有朱敬则上书武则天，申述这两人无罪，并说，这两人“素称忠正，而所坐无名。若令得罪，岂不失天下之望也”。这两人在他的帮助下，因而免死。奸臣张易之为武三思等 18 人画《高士图》，多次拉朱敬则“予其事，固辞不就，其高洁守正如此”。朱敬则任职时，所推荐的人才，都很能干，“则天以为知人”。

《旧唐书·朱敬则传》记载：朱敬则“倜傥重节义，早以辞学知名”，他“尝采魏、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，著《十代兴亡论》”。

又以前代文士论废五等者，以秦为失，事未折衷，乃著《五等论》”。这也是毛泽东称他为“历史家”的根据。

朱敬则很清廉，神龙二年(706)他被诬陷，遭贬回到家乡，行囊中“无淮南一物，唯有所乘马一匹，诸子侄步从而归”。“敬则重然诺，善与人交，每拯人急难，不求其报。”对这两段引文，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，并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圈。

真正的政治家才懂得因时而变政。不知机变者“宽严皆误”。毛泽东读史真读到了骨头里，历史的精髓尽取。

刘幽求能伸不能屈

《旧唐书》卷九十七《刘幽求传》载：

刘幽求，冀州武强人也。圣历年应制举，拜阕中尉。刺史不礼焉，乃弃官而归。久之，授朝邑尉。初，桓彦范、敬晖等虽诛张易之兄弟，竟不杀武三思。幽求谓桓、敬曰：“三思尚存，公辈终无葬地。若不早图，恐噬脐无及。”桓、敬等不从其言，后果为三思诬构，死于岭外。

读此，毛泽东批道：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，年六十一，以患死。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227页）

刘幽求是唐睿宗、唐玄宗时的大臣。毛泽东的批语，写在其本传的开篇之处。刘幽求早年初拜阕中尉时，仅以刺史没有礼貌



待他，便“弃官而归”，也足见其能伸不能屈的致仕作风。这个特点，在他后来的宦海生涯中，突出表现为不甘人后的争权。

《刘幽求传》载，先天元年（712），唐玄宗初即位时，迁之为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而“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，而志求左仆射、兼领中书令。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，崔湜为中书令，幽求心甚不平，形于言色”。恰逢崔湜依附阴谋政变的太平公主（唐玄宗的姑姑），刘幽求向唐玄宗进言以羽林军诛之。事泄，被做了太上皇的唐睿宗流贬到封州，后来太平公主等被诛杀后才被重新起用。开元初年，刘幽求任尚书左丞相，不久改任闲职太子少保，又因“郁快于散职，兼有怨言”，先后削贬为几个地方的刺史，竟在路上“愤恚而卒”。毛泽东说他“能伸而不能屈”，终“以恚死”，显是批评他心胸不宽阔，能上不能下，不善处逆境。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说到逆境对人的锻炼，如从苏秦和张仪的故事认为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，还有司马迁的“发愤之为作”等，都告诉人要善处逆境。

史识的极端重要性

《旧唐书·刘子玄传》载：

子玄掌知国史，首尾二十余年，多所撰述，甚为当时所称。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：“自古以来，文士多而史才少，何

也？”对曰：“史才须有三长，世无其人，故史才少也。三长：谓才也，学也，识也，夫有学而无才，亦有良田百顷，黄金满籯，而使愚者营生，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。如有才而无学，亦犹思兼匠石，巧若公输，而家无楸枰斧斤，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。犹须好是正直，善恶必书，使骄主贼臣，所以知惧，此则为虎傅翼，善无可加，所向无敌者矣。脱苟非其才，不可叨居史任。自亘古以来，能应斯目者，罕见其人。”时人以为知言。

刘知几(661—721)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，字子玄，彭城(今江苏徐州)人，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、左史等职，兼修国史，玄宗时官至散骑常侍。其所著《史通》内外共49篇，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，影响很大。刘知几生平专攻史学，通览各史，能分析其利弊得失，又屡任修史之责，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，故提出才、学、识为史家必备的素质，其中尤以史识为最重要。从前面引述的《旧唐书》本传中的一段原文可知，刘知几说的史识，主要是鉴识明晰，要“好是正直，善恶必书”，以此影响时政，从而达到“善无可加”的境界。在《史通》内篇卷七《鉴识》中，刘知几又专门论及史识，说“物有恒准，而鉴无定识”，历史是客观存在的，但人们认识它，却由于“识有通塞，神有晦明”的区别，于是“毁誉以之不同，爱憎由其各异”，这样，“辨其利害，明其善恶”的史识就尤其显得重要了。

毛泽东 1958 年 5 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：



唐朝有个刘知几,是个历史学家。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:才、学、识。他说的识,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。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,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,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。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,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,那还是很迟钝的。(毛泽东:《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》1958年5月20日)在这个讲话提纲的手稿中,毛泽东写道:

才、学、识,这里讲的是识,刘知几,识的极端重要性
在这段话之前的内容,是:

插红旗,辨风向

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,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,或者其他人插灰旗

提高嗅觉,辨别风向

显然,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具有“极端的重要性”的“识”,主要是指“辨别风向”,“识别风向的能力”,也就是明察政治“风向”的政治眼光。

毛泽东在强调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的时候引述刘知几关于“史识”的观点,说明他对刘知几史学理论的熟悉。刘知几在《史通》内篇卷七《鉴识》中又专论史识,以为鉴识不明,对历史的见解一定会发生歧误:



夫人识有通塞，神有晦明，毁誉以之不同，爱憎由其各异。盖三王之受谤也，值鲁连而获申；五霸之擅名也，逢孔宣而见诋。斯则物有恒准，而鉴无定识，欲求铨核得中，其唯千载一遇乎！况史传为文，渊源广博，学者苟不能探蹟索隐，致远钩深，乌足以辨其利害，明其善恶。

“物有恒准，而鉴无定识”，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，但人们认识历史事实，却由于“识有通塞，神有晦明”的区别，于是“毁誉以之不同，爱憎由其各异”。他以为大约“铨核得中”之不易，可以说“千载一遇”。他还强调要真正“辨其利害，明其善恶”，还需要“探蹟索隐，致远钩深”的功夫。

毛泽东作为长期专心于史的政治家，其史识也多表现出独异卓越之处。

刘知几论史之“鉴识”，举三王由“受谤”而“获申”，五霸由“擅名”而“见诋”为例。我们讨论毛泽东的史识，也可以首先分析他表现于历史人物评价方面的卓见。

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而又好史，其史识自是别具一格，他对历史上许多人物的评价，多异于古人，显然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无关系。至于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引用刘知几的史识之说，自有其特殊所指，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重在提高“识别”社会上各种政治风向的能力，使同志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。这就把刘知几说的“识”从历史的角度拉向现实的眼光。



《旧唐书》概论

《旧唐书》是五代时期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唐史。该书完成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(945)至宋代欧阳修、宋祁等新撰的《唐书》问世,为了区别两者,故称此书为《旧唐书》,而称新撰的《唐书》为《新唐书》。

—

唐代立国不久,为了借鉴前朝历代治理天下的经验、教训,颇为重视历史的研究与撰修。在太宗李世民时期,就在修撰前代历史的同时,开始了本朝历史即“国史”的史料积累和史书编纂工作。在随后的二百多年间,唐代政府对本朝历史的编纂,积累了大量的史料:首先,历代皇帝实录。唐代的皇帝实录,起自太宗命房玄龄“撰录”。房玄龄“删略”高祖李渊、



太宗李世民的起居注为编年体，撰成高祖、太宗实录各二十卷，开始了一位皇帝一部实录的编纂。据统计，唐代共修成皇帝实录二十六部，另外，唐代大量的官修国史，唐人私撰唐史，唐人私人其他著述文字都对编纂《旧唐书》也起到重要作用。

有唐一代留下了大量的本朝史料，这些为后来撰修《旧唐书》作好了一定的资料准备。不过，总体来看，自宣宗以后，即宣、懿、僖、昭及昭宣帝这五代皇帝时期的史料，因唐末五代社会大动乱而颇为阙遗，其“简籍遗落，旧事十无三四”，故令纂修者“吮墨挥翰，有所慊然”。正因有此，所以整部《旧唐书》自宣宗而下，不仅编纂工作难度特大，且所叙内容之质量比较以往各帝大为逊色。

二

《旧唐书》编纂于五代时期的后梁、后唐、后晋三朝。其编纂历程大致经历了史料的搜集和史书的纂修两大阶段。

早在后梁末帝朱瑱镇龙德元年(921)，史馆宰臣即奏请末帝下制正式搜集唐代史料。两年后(即公元923年)，后梁亡国，但史料搜求征集工作在后唐时期并未中断。

后唐明宗天成元年(926)，都宫郎中庾传美被任命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，专程前往蜀地收集到自唐高祖至代宗九代皇帝



的实录及杂书千多卷。这九帝实录对当时后唐史馆“煨烬无几”的唐代史料来说，“甚济其阙”。明宗长兴二年（931），崔棣核奏请“特命购求”唐宣宗以下数朝野史，得到了明宗的准可。第二年五月，史馆又奏请加紧收集“四朝”史料，并特地要求对两浙、福建、湖广等地颁行诏旨，加紧“采访宣宗、懿宗、僖宗、昭宗以上四朝野史”，以及“逐朝日历、除目、银台事宜、内外制词、百司沿革、簿籍”等史料。与之同时，史馆工作官吏也在准备着纂修工作。但一年后，明宗去世，越两年，后唐亡国。

在后梁、后唐两朝史官的积极搜求下，在史馆所收集的史料中，“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，德宗至文宗亦存实录；武宗至济阴废帝，凡六代，唯有《武宗实录》一卷，余皆阙略”（《册府元龟》卷五百五十七《采撰三》）。可见唐代后期尤其唐末史料仍然缺乏颇甚。故此晋立国后，一方面着手唐史的撰修，一方面同时加紧对唐代史料的继续搜求。后晋天福六年（941），石敬瑭诏令张昭远、贾纬、赵熙、郑受益及李为光（一作先）等人“修撰唐史”，令宰臣赵莹监修。一个多月后，贾纬因母亡归家守丧，赵莹又奏请吕琦、尹拙等同修。在此之际，赵莹再次奏请下诏购求唐朝史料，并提出了完整的修史计划，即“只叙本纪、列传、十志”，其中“本纪以纲帝业，列传以述功臣，十志以书刑政”。后来《旧唐书》的成型，基本按照这一计划实行。

综观整部《旧唐书》的编纂，参与其事者有下述诸人：



监修赵莹(885~951),字玄辉,华阴人。曾于后唐明宗时随石敬瑭掌管府内文翰。天福元年后晋政权建立后,他被任为翰林学士承旨、户部侍郎、知河东军事府,不久即升为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监修国史。天福六年(941),他奉诏监修唐史。他于《旧唐书》的编纂,虽然未竟其业,但贡献颇著,《旧五代史·赵莹传》记曰:“监修国史日,以唐代故事残缺,署能者居职,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,莹首有力焉。”

监修桑维翰(898~946),字国侨,洛阳人。曾为石敬瑭掌书记,后晋立国,他被授为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、知枢密院事。不久即改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,充枢密院使,后累有升迁,官至检校太傅,封爵魏国公。天福八年(943),受命监修国史,其间兼管唐史的监修工作。

监修刘昫(888~947),字耀远,涿州归义(今河北容城东北)人。后唐明宗长兴四年(933),他自端明殿学士拜相,为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末帝清泰元年(934),兼判三司,加吏部尚书、门下侍郎,始监修国史,两年后离史任。后八年,他复判三司,监修国史。在《旧唐史》的定稿时期,他起过一定的作用,故当《旧唐书》撰成后,由他领衔上奏。

在上述三任监修外,参加《旧唐书》编纂的人员尚有张昭